
从模仿的角度看拟态到表演：关于像似性的普遍理论的思考¹

约伦·索内松/文
汤文莉/译 梅林/校

摘要：几乎所有关于像似性的理论都是对其主题的指责（例如古德曼、比尔曼和早期的艾柯）。我自己的像似性理论，是为了在这些批评声中保留一种特殊的像似性和图像性。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我区分了纯粹的像似性，像似基础和像似符；另一方面，我还区分了初始像似符和次生像似符。但是在我做出以上区分过后，发生了几件事。一方面，其他人已经证明了我为解释图像性而创建的概念工具与语言像似性有关。另一方面，一些与我有不同出发点的符号学家已将拟态确定为在动物世界常见的一种像似性。在迪肯的进化符号学中，像似性被如此普遍地提及，以至于它似乎被清空了所有的内容，而在唐纳德发明的变体中，模仿这一术语被用于像似意义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考虑像似性理论向新领域的延伸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开发新的模型。

在皮尔斯（Peirce）的哲学的框架内，像似符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像似符的存在却受到质疑：如亚瑟·比尔曼（Arthur Bierman）和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哲学家以及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和雷内·林德肯斯（René Lindekens）等符号学家。在从 1989 年（Sonesson, 1989）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中，我试图恢复像似性的概念，至少在图像这方面，我没有像罗兰·巴尔特（Barthes 1964）那样用“同义反复”，或像艾柯（1999）那样提出的一个与他早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结冰的镜子”。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会批评古德曼、比尔曼、艾柯等人（cf. Sonesson 1989,1993,1995,2000a），而是将我的发现作为一个积极的理论来阐述，然后继续考虑一些更远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像似性概念分别来自“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生态学派”（“the ecological school”）和“现象学派”（“the

1 原文：Sonesson, Göran (2010). From mimicry to mime by way of mimesis. *Sign Systems Studies* 38 (1-4):18-65.

作者注：我终身都关注着像似性，但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一直参与其中的不同的项目（SGB 和 SEDSU）以及自 2009 年 1 月以来我领头的认知符号学中心的内部合作，都为我的旧主题提供了新的展望，而我在本文中已经试着利用这些展望了。我想在这里感谢上述论坛上的无数讨论为我提供的许多帮助。同时我也要感谢（针对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蒂莫·马南（Timo Maran）和埃斯特·沃索（Ester Vösu）提出的建设性评语，这个我在下文会提到。

phenomenological school”) 的理解途径 (cf. Saint-Martin 1994; Carani 1999; Nordstrom 2000) 。这个概念的基础既不来自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学说, 也不来自于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学说, 而是来自于由埃德蒙·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提出的, 阿伦·古尔维奇 (Aron Gurwitsch), 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ütz) 和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等人发展的现象学。然而, 这种像似性的理解途径首先在我的《图像概念》 (Sonesson, 1989) 一书中被提及。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生活世界”, 也被称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常识世界”, 或者基于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 (James Gibson) 的生态物理学, 这个概念被视为所有可能意义的基础。这也对我们解释基本概念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如符号、像似性和图像性等基本概念。在许多方面, 比起索绪尔的符号学, 生态符号学与皮尔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更接近, 更相容²。如果后者被理解为法国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 就更是如此。在这个框架中, 受索绪尔启发的许多符号学概念仍然保留着它们的含义, 但只是在次要的层级上。然而, 法国结构主义 (当然还有布拉格学派) 几乎没有考虑到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相关性或“关联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我对像似性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将从皮尔斯基础概念的解释中重新出现。

从像似性到像似符

尚不确定的是, 皮尔斯是否想说有三种特性能将一种现象转化为一个符号, 即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 或者他是否只是想表明符号可以, 或者更进一步地说, 具有像似性、指示性和/或规约性。不管皮尔斯想法如何, 我在这里都会接受后一种解释。因此, 我将以比皮尔斯或者索绪尔所使用的更为具体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符号的特征, 继而我会指出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是如何体现在符号中的。然后, 我会考虑这些概念在符号的范围之外可能意指的东西。

1.1 作为原型符号过程的符号

皮尔斯在其晚年认识到, 他所有的概念都太狭隘: 他反思到, 他真正应该谈论的不是“符号”而是“媒介”、“分支”或“媒介化” (CP 4.3 和 MS 339, Parmentier 1985) 。事实上, 他甚至认为, “符号”这个词所承担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其本应承担的。在这里, 皮尔斯听起来就像矮胖子 (译者注: 出自于鹅妈妈[Mother Goose]的童谣中的登场人物, 也出现在境之国的爱丽丝。外形如鸡蛋, 现用于指损害后就无法修复的东西。) 一样, 终于看穿了诡计。而且, 这

² 在皮尔斯的显像学中, 作为产生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许多可能的变体之一, 见 Sonesson 2009b。

也符合皮尔斯的“术语伦理”，“术语伦理”规定我们不应该引入“干涉任何现存术语”的术语（see EP2: 263-266）。奇怪的是，那些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皮尔斯派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到皮尔斯这方面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将把符号作为可以实现意义的（更复杂的）方式之一。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些符号的核心例子是怎样的，然后尝试确定它们的共同之处。语言符号显然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图像符号（将在下面详细说明从哪种意义上说）基本上与语言符号相似，至少有一些手势也与语言符号是相似的。逢场作戏同儿童的象征性游戏一样，大概也属于这个大类。当然，我不像翁贝托·艾柯、纳尔逊·古德曼（1968）和其他许多我早就拒绝过其论点的学者一样（cf. Sonesson 1989,1993,1995,2000a），我并不认为这些意义都是规约的。我甚至不认为逢场作戏和象征性游戏与图像具有同种像似性；事实上，我将以上三项与语言符号进行了比较，语言符号基本上是规约的。但是，它们都（至少）拥有两部分：允许一个规约存在的东西，以及一个理据性的关系。事实上，索绪尔（1973）在这里是一个更加细致的现象学家，除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指称物之外，符号本身有两个部分，因为除了被感知的部分外，还包括以特定的方式来解释指称物的部分。

根据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儿童发展的描述，每个孩子在增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时候，都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在当下的语境下，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皮亚杰（Piaget 1967[1945],1967: 134ff, 1970: 342ff）声称，在感知运算思维与具体运算接界的地方，即约 18 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学习掌握“符号功能”（原称规约功能），其不仅涉及语言，还涉及绘画和象征性游戏。皮亚杰并不否认小孩在这个年龄之前经历过意义，例如在感知中经历意义（因此预期到了特里瓦森和洛戈泰蒂[Trevarthen & Logotheti 1989]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只有在达到了符号功能的情况下，小孩才能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皮亚杰在这里说的是“生产”语言、图像等的能力，而不是解释它们的能力。就语言而言，理解图像的能力很自然地被视为先于生产图像的能力。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符号功能出现的时刻，我们关心的是符号结构。

“区分”这一通常被忽视的概念在我的观点里是基本的概念。然而，保持主客观差异的区分也是不可或缺的。符号的功能，或者，从现在开始我会说，符号（功能）需要“根据主体自己的观点，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进行区分”（Piaget 1967: 134f）。因此，例如，几乎完全隐藏的对象的可见末端是整个对象对于婴儿的能指，但其也恰好是“所指的客观方面”，因此，皮亚杰称（同上），它不是一个符号。但是，皮亚杰又称，当孩子用卵石来表示糖果时，孩子很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主观的区分。

虽然皮亚杰明显没有这样说，但是他的区分概念在我看来与霍基特（Hockett）的“设计特征”（译者注：设计特征为语言学概念，指定义人类语言的特征，例如任意性、二重性等等）的位移有所不同（cf. Hockett, Altmann 1968）。至少在其他地方，我认为鸟笼上展示出笼子里的动物图像和名称的标签与笼子里的动物也是区分的，因此这是一个符号（cf. Sonesson 2009b）。另一方面，位移似乎预示着区分。

奇怪的是，皮亚杰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无法客观区分的东西不可能主观区分。然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皮亚杰的实例中的那个孩子，他用卵石来代表一块糖果，却不用一片羽毛来代表一只鸟，也不用一块卵石代表一块岩石，他不会混淆部分和整体：那么当孩子“从他的角度”来区分前者和后者时，他将采用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客观上”是鸟或岩石的一部分。此外，与皮亚杰的主张（Piaget, 1967:134）相反的是，猎人通过踪迹识别动物，然后利用踪迹找出动物的去向，继而捕捉动物，尽管动物和其踪迹之间存在着物理和时间的关系，在猎人对符号的解释中，他并不会分不清踪迹与动物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看到踪迹时会感到满意。事实上，如果踪迹与产生它们的动物没有区分，它们就不能被看作是符号，它们就仅仅是动物作为其一部分的复杂情况的一部分。区分可能因为是作为能指的对象在空间和/或时间上与所指的对象不连续，也可能是因为能指与所指对象具有不同的一般世界范畴，但也可能还有其他有待界定的标准。

如果我们说索绪尔和皮亚杰在现象学方面还做得不错，但是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期待胡塞尔本人为符号的现象学做出一些贡献。实际上，胡塞尔对符号的讨论（他称之为“再现”）可能有助于我们阐明“主观区分”中所涉及的内容。事实上，根据胡塞尔（1939）的观点，两个或更多的项可以进入不同类型的“配对”。从两个共现项形成的“成对关联”到真正的符号关联，前者通过其中一个项呈现而另一项经由第一项而间接地给出，形成一种“共现配对”，后者也是一个项直接呈现而另一个项间接呈现，但这个间接的项是主题，也就是意识关注的中心。这清楚地表明，符号是双重意义上的不对称：其中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清晰，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直接。另一方面，在感知上，最高度的聚焦和直接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这些观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主题构建，而这个构建本身是与它是意识领域的一部分的主体相关的，所以符号的第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立场，它的主体呈现另一个立场。用更熟悉的术语来说，符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另一部分的。当然，这更容易适用于内容和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后者将符号之外的世界与同符号有关的事物相对应。实际上，胡塞尔（1980）只在他对图像意识的研究中才明确地区分了这一点，他指出被描

绘的柏林宫殿在图像中，而真正的宫殿则在柏林（cf. Sonesson 1989: 270ff, 2006; Zlatev 2009）。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出的（Sonesson 1989:193ff），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某种从表现到内容再到指称物的主题层次（通常情况下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属性最低限度地定义符号：

- a. 它包含（至少）两个部分（表达和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独立于它所代表的事物（指称物）；
- b. 从涉及到符号过程的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些部分是不同的，尽管它们可能不是如生活世界中的常识那般客观（除了作为构成生活世界的符号）；
- c. 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不对称，因为其中一部分，即表达，比另一部分能更直接地体验到；同样也因为另一部分，即内容，比其他部分更加清晰；
- d. 符号本身主观上与区分于其指称物，指称物比符号的任何部分都更为间接地为人所知。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号对于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物种（更不用说单细胞）极少（如果有的话）是可用的，并且它在儿童发育到相当晚的时间才可被习得。要证明这种说法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问猴和鸽子，或者就上文所说的，婴儿或稍大些的孩子，他们是否有符号。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实验研究，而实验研究只能进行间接测量。

图像可以作为最好的测试案例，因为不像语言符号，图像必须包含相似性和差异性。以下逐一系列出解释：首先，甚至连表明动物不具备任何符号过程都是荒谬的。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被定义为符号的特殊符号过程。其次，在当前的背景下，没有任何推定，无论是不是隐藏的，图像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事物，而不是像马南（Maran）所怀疑的那样⁴。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包括抛光金属板（后来是真实的镜子）的那种现代的人性化的自然，那么毫无疑问，唯一类似图片的物体是水面。图像的增强体验是否能够增加动物的图像解读能力，这的确是个问题。

实验表明，即使是 5 个月大的孩子，看玩偶的时间也比看玩偶图片的时间要长（DeLoache, Burns 1994）。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把图像看成图像。事实上，9 个月大的孩子，而非 18 个月大的孩子，把所描绘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对象并试图去抓住它（DeLoache 2004）。不管他们所感知到的差异是什么，但这种差异似乎并不涉及与对象相对立的符号。这个结果表明，图像和它的对象被认为是不同的，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符号载体和它的指称物。真正的

³ 如果我们认为盎格鲁 - 撒克逊语言哲学中所谓的“不透明的语境”是例外，那么指称物通常也会比标志更清晰。参见 Sonesson 1989: 193ff。

⁴ 如果没有另外指出，马南的这个评论以及之后的评论来自本文的编辑评论

玩偶也许被看作是这个范畴的一个更原型的实例；或者，由于具有更多的感知谓项，真实对象可能更有趣。

在 SEDSU 项目 (Zlatev et al. 2006) 中进行的一个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用卵石或香蕉切片的实物或摄影图像对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了测试，这些实物和图像以不同的对照组呈现 (Parron et al. 2008; 在 Sonesson, Zlatev 中总结, in press)⁵。当所有种类被放在一起时，大多数实验对象选择了真正的香蕉，当真香蕉和香蕉图像被相对放置的时候，几乎没有实验对象会选择香蕉图像。除黑猩猩之外，大多数被测试的灵长类动物在面对香蕉图像和真卵石时，会选择香蕉图像，以及在香蕉图像和卵石图像之间会偏向选择香蕉图像，且这些动物都有尝试吃香蕉图像的趋势。因此，这或许暗示，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黑猩猩对符号有一些了解，而不是简单地把香蕉图像看作是香蕉种类中的不太好的香蕉。SEDSU 项目中的另一个实验涉及到一只单独的黑猩猩，亚历克斯 (Alex)，它接受了预先训练，模仿 20 个不同的动作序列，在一个新的实验中，在有提示的情况下，它被要求执行这些动作，但提示不是像以前那样是真人模特给出的动作，而是在视频、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和图画 (Call et al., in press) 上显示的动作。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显示的图像代表序列的最终阶段之前，以及图像最终状态时，黑猩猩能够完成这些动作。黑猩猩在这里未必只是简单地把静止的图像和动作混淆起来了，特别是当图像显示出一个不完整的动作、提示动作的画面与所要求的动作截然不同时，不仅因为图像显示的是一个动作的静态视图，还因为图像没有在完整或最具特色的状态下显示动作。那么，也许对图像符号的理解在黑猩猩的能力范畴之内。

1.2 符号内的像似性，指示性，规约性

我们习惯区分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虽然以前有很多类似的区分，但是现在皮尔斯的术语是最常用的。然而，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考虑，在具体的前提下，这些术语中有些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则不然。我不想在下文与这三分法进行论辩。相反，我将介绍这种特殊的皮尔斯三分法，这种三分法似乎与现象学的经验是一致的，就其本身而言，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于它们在形成具有符号功能的基础和进一步的基底时的作用。

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之间的划分是皮尔斯的三分法之一。因此，它必然依次与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这一基本范畴有关。严格以皮尔斯的术语来看，像似性是“再现体”（表达）可能遵循其“对象”（内容或指称物）的三

⁵ SEDSU 项目（“符号使用的演变和发展阶段”）是欧盟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包括瑞典、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作者与约旦·兹拉特夫 (Sonesson, Zlatev, in press) 写了结论。

种关系之一。这是三种关系中可以作为两个事物形成符号的“基础”的一种关系。更确切地说，像似性是这三种关系中的第一种，（当它被应用于讨论关联时，）术语上被称为第一性，“如其所是，不论其他”（CP 5.66）。我们必须首先从像似的“基础”，或者从被描述为“潜在的像似符”的事物来考虑像似性。皮尔斯本人用“抽象”来识别“基础”，以用两件黑色事物的黑色来举例说明（CP 1.293）。事实上，皮尔斯的文章中的某些段落（CP 1.551-3; EP1: 1-10）似乎暗示他会为挑出的一部分表达保留“基础”一词，并使用术语“相互关联”作为内容的相应部分。然而，这似乎会消除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关系特征⁶。因此，似乎“基础”这个词可以代表两个物进入符号功能的特性，它们依靠这一特性连接起来，即，事物的一些特性作为表达，而另一些特性作为内容。基础是符号的一部分，具有选择表达和内容的相关要素的功能。这就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形式”，与“实质”相对，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在音韵学领域中，将其称为有关性或相关性⁷。

套用皮尔斯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说两个项目共享一个像似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项目具有一些彼此独立拥有的某些特性，当从特定的角度考虑时，这些特性是相同的或类似的，或这些特性可以被感知，或是被体验为是相同的或类似的。然而，还需要一些比他的观点更进一步的注释。在这里，相似性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基本差异的特征。两个具有共同像似基础的项目，具有成为这一像似基础的表现和内容的能力，易于拥有构成像似符的符号功能，但像这样的基础也可能直接在感知中有其他用途。后一种可能性与皮尔斯所设想的不同，但是由于我们的符号的概念更加精确，因此范围更加狭窄（cf. Sonesson 1989:201ff, 2001a, 2007, 2008 in press）。

与作为一种关系的指示基础相反，像似基础由一组归属于两个不同“事物”的两类属性组成，这两个不同的事物被认为独立地具有所涉及的属性，不仅是符号关系的属性独立，彼此也互相独立。指示性涉及两个“事物”（第二性），因此可以独立于符号功能形成。虽然像似性是首要的，但它只涉及一个“事

⁶ 虽然皮尔斯在任何引用的文本中都没有提及这一点，但从两种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是皮尔斯在其他地方注意区分的一个抽象：从第一个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分离”，因为它把黑色这一品质从其他颜色中分离出来（不同于“割离”，其可以将独立存在的事物分开，也不同于“辨别”，其区分的是只能在思想上划分的东西）；但它也是一个“实体抽象”，因为它从一个特性推到一个对象（胡塞尔会说这是“名词化”）。关于“皮尔斯的两个抽象理论”的启发性处理，参见谢恩费尔特（Stjernfelt 2007: 246ff）。

⁷ 我确实认为基础一定是第二性的，因为它是相关的，我在表 1 应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尽管就像德奎佩里（De Cuyper 2008: 69）所指出的那样，我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将其阐明。正是因为这个（像似的）基础是相关的，与纯像似性相反，所以上文所说的与马南的明智的言论相反的说法，与下文引用的皮尔斯的定义并不矛盾，根据皮尔斯的定义，像似性独立于任何其他涉及其他事物所带有的特性。参见索内松 2006,2007,2009a, 2010 即将发布。

物”。事实上，正如皮尔斯（CP 3.1, 3.362, 4.447）一直不断重复地那样，一个纯粹的像似符号根本不可能存在：它是一种无形的品质。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会一瞬间出神。或许我们还可以用一些皮尔斯他自己的例子。黑鸟的黑色，或富兰克林（Franklin）是美国人的这一事实，可以被当作像似性；当我们比较两件黑色的东西，或者从作为美国人的角度来比较富兰克林和朗福德（Rumford）（译者注：本杰明·汤普森[世称朗福德伯爵]，他跟富兰克林的名字都是本杰明，因此本文作者在此拿两者举例对比），我们建立了一个像似基础；但是只有当一件黑色的东西被拿来代替另一件黑色的东西，或者当朗福德被用来代表富兰克林的时候，它们才会成为像似符（或者像皮尔斯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亚像似符）。正如指示性是可以形成的，但是在进入符号关系之前，它并不是一个符号，像似性有某种本质，但它要在比较发生时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指示性是一个潜在的符号，那么像似性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基础，表 1 列出了这一点。以下还有一点意见：我最近必须认识到的是，考虑到在这里提出的更精确的符号的定义（cf. Sonesson 2006,2007,2009a, 2010 and 1.3）显然有很多实例表明很多规约基础都不是符号（交通法规等等），尽管这不幸地破坏了表格美好的三元和谐。

表 1.从皮尔斯的角度来看（正文中修订）原则、基础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表中的规约性的基础以斜体标出，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皮尔斯不允许任何这样的基础与符号关系有所区别。

	第一性 印象	第二性 关系	第三性 规则
第一性原则	像似性	--	--
第二性基础	像似基础	指示性=指示基 础	规约性=规约基 础
第三性符号	像似符	指示符	规约符

因为像似基础是建立在这两个项目拥有的属性的基础之上的，仅仅因其如其所是，所以比较的标准必须是相似性或者同一性。事实上，皮尔斯还提到，一个像似符（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亚像似符）是“代表某物的符号，仅仅因为它与其类似”（CP 3.362）或“它是该对象中的一部分”（CP 4.531）。当认为像似性能引起“指称错觉”，并在抽象的基础结构之外形成“比喻的”意义的阶段时，格雷马斯（Greimas）与库尔泰（Courtes 1979: 148,177）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将像似性等同于感知外观。然而事实上，像似性不仅没有特别涉及“光

学错觉”或“现实渲染”，而且也不一定涉及感知谓项：皮尔斯举的许多实例（cf. Sonesson 1989: 204ff）都与数学公式有关，甚至作为美国人的这一事实也不是真正感知的，尽管它的一些表现可能是。这就是在这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像似性的概念。

1.3 世界上的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

感知充满了意义，这个意义往往可以通过像似的和/或指示的方式表达出来。根据现象学家阿伦·古尔维奇（1964: 176f）的观点，感知具有意义，但是是在“比通常所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往往是“限于符号中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符号。事实上，正如古尔维奇（1964: 262ff）所指出的那样，某种意义（或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符号过程对被作为标记符的表面上的一些不规则现象来说是必要的，甚至在这些标记符作为文字意义载体之前就是必要的。古尔维奇在批评其他心理学家时指出，意义的载体不是符号的意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表达不是内容的一部分，这与感知不同：后者是由属于一个大整体中的部分观点（获意对象）组成（译者注：胡塞尔所谓的意义，即意指对象）。从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ull 1956）的“含义学说”（Bedeutungslehre）中来看，意义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不会涉及任何符号（cf. Sonesson 2007）。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Sonesson 1989）所作出的区分，感知涉及的整体，是“大于”其部分相加起来的结果的；符号必须与它所代表的东西不同的“其他东西”相关。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当然在思考如何将每个给予感知的东西在水平方向上整合进一个更广泛的感知语境、图形或格式塔。这种关系肯定与指示性有关。但是还有一种视角，即某种事物比起初看起来更像是垂直地追求相同的隐喻，因为它属于某个特定范畴。我们所说的分类是一种直接的，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即“分类感知”），就此而言，这显然与像似性有关。当然，它不是与像似性“本身”有关，而是与像似基础有关，因为任何基础都必须假设关系性思维。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提出的两个解释区分的特征是为了在此意义上排除太多的指示性（不连续性）和像似性（不同类别）。

迪肯（Terrence Deacon 1997: 74ff）在其使用皮尔斯的术语所著的第一篇神经心理学论文中提到，符号出现在夜晚，此时所有猫都是灰色的。事实上，一遍又一遍地对同样的“东西”所进行的感知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坚持说，就像伪装一样：飞蛾的翅膀被鸟类看作是“树的一部分”。他接着说，像似性就是认知，即一个范畴的识别，甚至是“刺激物的归纳”（Deacon 1997: 77ff）。然后他称像图像这样的“典型案例”在本质上是一类的：图像能变为像似符，

是因为“图像与其所描绘事物的轮廓和表面处在同一方面或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虽然没有区别这一事实就是像似性本身，但认识和/或分类似乎需要对某种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必须依靠一个像似基础，图像是一个完整的像似符（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会提到，这是一个初始像似符 [cf. Sonesson 2006]）。

尤克斯库尔所做的经典实例显示，当蜜蜂感觉到哺乳动物的皮肤腺释放的丁酸的气味时，它不必思考两次；它不必告诉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人，不是一只兔子或一只狗，但它们有相同的气味。事实上，因为蜜蜂的一生中只有一种这样的气味，所以它不能比较气味。但即使其经验范围较大，也不会进行比较。对蜜蜂来说，哺乳动物的味道只有一个。就像马南所说的那样，这种哺乳动物的气味当然可以被描述为蜜蜂遗传记忆中的一种，但是这种气味是这种记忆唯一可用的一种气味⁸。

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在这个普遍性中感知世界。我们经常观察到，我们对语言的声音有一种范畴化的感知，因为它的物理特征是渐变的，但是根据我们语言的规则，我们感觉到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个点上，存在分离不同音素的边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声波中包含的其他信息来确定说话人的方言，语调等等。但是，蜜蜂显然不关心兔子或狗在丁酸的一般气味上所做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某些现象看作是一个特定类型的例证 -- 也就是说，在我们意识到这个类型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个实例。

皮尔斯用“类型符”和“个别符”（或“复本”）来描述类型和范例之间的区别⁹。例如，在上文的句子中，出现过一次的“和”一词被认为是一个类型符，而出现过两次的“和”则被视为个别符。字母“t”也只是一个类型符，与此同时，仅仅在本段的第一句就出现八个该字母的个别符。这个推理很容易扩展到其他意义系统；伦纳德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与另一种复制品属于同一类型，但其他同样存在的画作来说，它们构成了两个范例或个别符。从整体上来看，这篇文章是一个单一的类型符，但这本期刊印出多少本，这篇文章就有多少个个别符。大致上看，这篇文章似乎是一个符号，其类型符提供了可能被普遍共享的一个以上的个别符，并且可以说，这些符号在散播时还保留着其本源的样子。

8 用严格的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当处在第一性阶段时，这当然不是一个“类型符”，而是一个“风格符”。

9 如上所述，在皮尔斯的概念中，蜜蜂的经验可能只是一种作为第一性的“风格符”——与作为第二性的“个别符”和作为第三性的“类型符”在同一个三分法中。但是就如谢恩费尔特（2007：241ff）辩驳迪肯的那样，如果蜜蜂的经验已经是“规约的”，那么这是不是已经不处在皮尔斯所说的类型符的水平了？当然，要确定皮尔斯的范畴的应用并不容易。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蜚是否有部分和整体的经验。对于我们观察者来说，哺乳动物的存在有三个线索——丁酸的气味、皮肤的感觉和血液的温暖，但蜚不需要设想这些线索，这三个线索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存在的单一实体（按照吉布森的术语来说，是一种“实质”，[cf. J. Gibson 1979,1982]），这些线索或许更可能会构成三个独立的事件，产生它们各自的行动序列。蜚能感知到乙酸；只有我们¹⁰能感知到哺乳动物。另外，讨论丁酸或哺乳动物是否受到关注与否，是没有意义的。讨论是否直接给予丁酸或哺乳动物也没有任何意义。从蜚的角度来看，乙酸和哺乳动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蜚不仅没有符号，也没有太多的世界可以给蜚去探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作为一只蜚是什么感觉。但是这些区别在蜚的环境中（即按照功能周期来说）似乎毫无意义。

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特定类型或范畴：这就是独立于符号功能的像似性。一切东西也都是由部分组成的，并且/或者出现在别的东西的附近；这是指示性，甚至在它被用来构造符号之前就是了。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由具有不同特性的、属于不同范畴的以及出现在不同语境中事物（用吉布森的术语来说，是“物质”）组成的。正如冯·尤克思库尔所描述的那样，在蜚或者单细胞的世界里，以上所说的事物都没有意义。一些有趣的证据，甚至是一些研究（cf. Tomasello, 2008: 42f）都表明狗和猫的生活世界更像人类，更不用说类人猿的世界了。

在“生活世界”的常识中，有三种方法可以划分任何可能的东西：将其分成适当的部分（如头部，躯干，腿部等，如果整体构成人体的话）。将其分成不同的属性（参照同一个整体的话，男性与女性相对，成年人与儿童相对）；将其分成不同的视角或轮廓（从后面看到的身体，从四分之三视角中看到的头部等——[cf. Sonesson 1989,1996,2000a], in press）。这是三种因素性，它们与相邻性一起构成指示性，它们并非一种符号，而是一种基础。一个更为人熟知的术语是分体论——一个关于部分和整体的理论，这个理论来自胡塞尔（Husserl 1913）的早期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胡塞尔的前辈，如托德诺夫斯基（Twardowski）和美农（Meinong cf. Cavallin 1990），但分体论这个名字是由逻辑学家莱希涅夫斯基（Lesniewski）命名的（cf. Smith 1994,1995; Stjernfelt 2000,2007: 161ff）。有些人认为至少前两个部分可以组成层次：一个“外延”层次——从较大的部分到较小的部分（手臂 - 前臂 - 手指 - 指甲等），和一个“内涵”层次——从普遍具有的特性到更具体的特性（有生命的 - 人 - 老人 - 脾气暴躁

10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范围，要远远大于人类，正如马南所说，这里的“我们”可能与脊椎动物相当。从“外延”层次（这里指一种动物，而不只是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似乎是可行的，但从“内涵”层次上（极少数脊椎动物具有哺乳动物的概念，更不用说有脊椎动物的概念了）来看并不可行。见索内松 2009a, 2010 及以下段落。

的老人等）。后者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因范畴内成员越来越少而越来越窄的圈子。在外延层次结构中，子类别的空间消耗较少，而在内涵层次结构中，扩展则是持续的（只要你不改变指称物）。手臂和指甲的界限并不一致，但是一个老而脾气暴躁的人，和一个有生命的人可以是同一个人，虽然后者的属性更为广泛（因而内在更广泛）。

分体论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还要解释各种整体性之间的差异。胡塞尔反对集群构型，我们在整体心理学（*Ganzheitspsychologie*）的各种代表作中发现了相同但有时是更进一步的尝试（cf. Sonesson 1989: 81ff）。皮尔斯列了一个非常长但相当混乱的各种整体性的清单（cf. Stjernfelt 2000）。最近，许多心理学家把局部线索从两种更全面的感知模式中分离出来：“全局处理”关注的是最高层次的刺激；“构型处理”则涉及元素的层际空间的关系（see Sonesson, Zlatev in press）。

除人类之外，分体论经验的证据大多是间接的。关于鸽子和猿猴的图像感知以及其间的一切研究，都没能确定动物能够将图像视为图像，但这些研究肯定表明了，动物分别注意到了人类或者香蕉与相应图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see Sonesson, Zlatev, in press）。鸽子似乎也能够识别对象，不仅仅是在给出其所有部分的时候，且当描绘在视觉上变形时，至少只要包含了一些“真子”（译者注：理论物理学概念，一个假象的实体，一个完全由电磁场构成的引力体）的话，也就是说，只要存在可以从不同视角中识别出来，包括与同一对象的其他组件的关系的组件的话，鸽子就能识别对象。（cf. Peissig et al. 2000）。事实上，我们对亚历克斯（Alex）试图根据静态图像模仿动作所进行的研究包含了一些有限的动作阶段，这可以用来表明猿能够从时间片段中识别事件（Call et al., in press）。

海涅和库特夫（Heine & Kuteva 2007: 150ff, 276ff）在对语法起源的研究中，思考了在什么程度上“动物认知”可以理解“分层分类关系”，如内含物（类别成员）、所有物关系（我们的内涵层次）、部分-整体关系（我们的外延层次），以及社会关系，财产和位置。虽然他们考虑的证据与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不同，但是他们总结出，在已经研究过的动物中存在基本的层次思维能力，特别是猿，猴子和灰鹦鹉（至少一只）。他们继续提出了递归的基础结构，其他人称这是人类语言特有的，但他们认为这包含在“动物思维”的范围内（Heine, Kuteva 2007: 278f, 296f）。他们是否在暗示所有动物思维中可能缺乏用以获取某些特定的语法结构，如名词短语和从句分句的（全）递归，这一点难以确定。不管是什么造成了递归和/或语言和动物经验的之间的差异，但它一定不是抓住感知意义的基本原则¹¹。

¹¹ 海涅和库特瓦（2007: 304）认为，无头像的动物在岩画中的存在表明，部分-整体关系与 10.000-15.000

至于规约性，皮尔斯毫无疑问地把它看作符号关系的同义词（见表 1）。然而，如果规约性与像似性和指示性并行，涉及基于规则或习惯的现象之间的所有可以想象的联系，那么符号功能只是这种规约性的特例。因此，根据上文的定义（交通规则，例如国际象棋规则等等），不仅在生活世界中有不是符号的规约基础，而且也可以把符号功能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规约基础上，正如像似性和指示性一样：因此，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长期以来习惯（甚至是规范）女性穿裙子，因此裙子可能成为女人的一个符号，间接地通过描绘的方式用各种符号来表示女洗手间。

2. 初始和次生像似符

在皮尔斯所给的像似符定义中，他认为像似符的特性是，其不仅独立于符号关系（指示符也是如此），而且也独立于所涉及到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关概念若要体现独立，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一些会产生非常荒谬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说莱昂纳多（Leonardo）画的蒙娜丽莎肖像（Mona Lisa）（甚至是毕加索[Picasso]的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肖像）独立于被描绘的人。换句话说，我认为一些像似符的像似性与符号关系无关，因为它是对像似关系的感知，像似关系提醒我们符号关系的存在；但是，相反地，其他像似符的像似性依赖于符号关系，因为符号关系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像似性。我把这一大群符号分别称为初始像似符号和次生像似符号。

2.1 像似性在符号中的干预

像似性和规约性在符号中扮演的相对角色可以用来区分初始和次生像似性。事实上，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区分初始和次生的像似符，因为我们真正涉及到了像似性被分配给符号的方式。初始像似符是指，表达 E 和内容 C 之间的“相似性的感知”至少是 E 作为内容 C 的表现的部分原因。也就是说，像似性实际上是定位符号功能的理据性（基础），或者说是理据性之一。另一方面，次生像似符是指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认为 E 是内容 C 的表达，在某种特定的解释体系中，它至少是感知 E 和 C 的相似性的部分原因。那么，这就是部分激发像似关系的符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所称的次生像似符并不是一个关于像似性的好实例，因为关于后者的特点，皮尔斯给的定义显然意味着，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符号的像似性并不独立于它们符号特性：相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也许这不必被视为反对皮尔斯定义的一个论据：像似性本身可能独立

年前“概念上存在的”的语言学头部相关结构有关。这似乎是一个夸张的结论。由于刻在岩画上的是图像符号，所以在图像中出现的因子可能要比在感知中花费更长的时间，但并不是说它在语言中同时出现。

于符号功能，即使它在符号中的存在有时可能受到符号功能的限制。更确切地说，这里关键的是像似基础独立于符号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图像当然是初始像似符，且可能是唯一的初始像似符。事实上，鉴于在第一部分提到的关于猿和小孩的图像感知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至少达到两岁或三岁的人类来说，图像是唯一的初始像似符。可以说，人在两到三岁之前，图像对他们来说不是初始像似符，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符号，但它们与其同一类别中描绘的对象是相同的。这表明像似符的初始性和次生性与给定的（集体）主体有关。

另一方面，无论我们的年龄如何，我们都必须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按照特定的规约，那些通常用来表示自己的对象，会变成它们自己的符号、它们某些特性的符号、或变成它们所属的类别的符号：汽车展览会上的汽车，博物馆展示的石斧或商店橱窗里的手杖，国王去世后的他的扮演者，以及一个艺术展览上的小便器（如果恰好是杜尚[Duchamp]的'喷泉'的话）。当对象用以代表自己时，其显然是“像似的”：它们是由代表内容的表现组成的符号，因为它们每个都具有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一套约定和/或一系列的已有情境，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某件事物是一个符号或者它作为符号会代表什么：是以自己代表个体对象，还是代表其所属的一个特定类别（在几个可能的类别中），或者代表其某些特性。街上的一辆车并不是一个符号，但当其被放置在汽车展览中时，它成了一个符号。博物馆里的曼·雷（Man Ray）创作的铁块也是这样。我们必须了解陈列柜的规约，以便了解到商店橱窗里的锡罐可以代表许多同类别的其他物品。我们需要熟悉艺术展览规约，认识到每个客体都只是表现自己，而且我们能够理解裁缝的色板是其图案和颜色的符号，而非其形状的符号，除非我们已经学会了有关色板的规约（cf. Sonesson 1989: 137ff）。

当曼·雷制作一个台球桌的图像，我们不需要任何规约来识别它所描绘的内容。然而，如果谢莉·莱文（Sherrie Levine）的台球桌（真实的三维）要代表曼·雷的图像，就必须有一个标签来颠倒生活世界的权威。这表明，在确定一个物体功能的概率的属性中，一个像似符号的表现是三维的，而不是相反的。自现代主义阶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阶段以来，图像的符号功能一直处于关注的中心：因此，像莱文这样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来颠覆正常“生活世界”的层次体系，使得二维对象代表三维对象，而非用三维对象代表二维对象，就毫不奇怪了。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发现瑞典尽是“芭比娃娃”的墨西哥女人做了一些颠覆，因为在她特殊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基础上，至少在言语行为间，她把真实的，有生命力的人当作生物，把在装配线上制造的，由无生命的物质制成的物品当做娃娃。

但是，如上文提到的身份符号，可以说是对其本身过于像似的符号，并不是符号功能必须先于和决定像似性的唯一情况。在其他情况下，因为相似性“过少”，符号功能必须先于像似性的感知，据加里·克马利里（Garrick Mallery 1972 [1881]: 94f）所言，这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手工符号一样，当我们被告知它们的含义时，它们似乎是合理的。用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 1969: 92f）的话来说，一个“图示猜谜”（译者注：一个美国游戏，一个人画一副四不像的图片，让其他人去猜他所画为何物，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答案来取乐。同时该游戏也用于人类的认知研究，研究儿童的创造力。）不同于需要解谜关键的图像，就像卡拉奇（Carraci）画的墙后的泥瓦匠（图 1b），或是“正落入马提尼杯的橄榄或穿着暴露泳衣的女孩的特写镜头”（图 1a）。虽然在画面中这两个场景都可以被看到，但显然这都是由画面所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模糊性。第一个方法是填充细节，特别是橄榄和肚脐，空气和一双大腿等特征不同的细节。然后在某个时刻，这个图示猜谜就会变成一幅真实的图像。另一种可能的方法，也是像似性批评者唯一认同的，就是引入一个明确的规约，比如卡拉奇的解谜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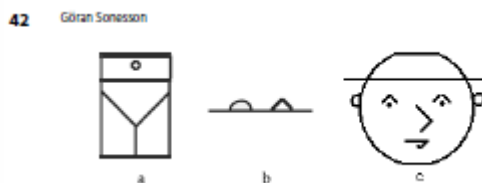


图 1.两张图示猜谜和一张可以看作是图示猜谜的图像：a）正落入马提尼杯的橄榄、或穿着暴露泳衣的女孩的特写镜头（受到阿恩海姆的启发，并在 1992 年提及[Sonesson 1992]）。b）卡拉奇的解谜关键（墙后的泥瓦匠）；c）面部或瓶子（受到赫默伦[Hermeren 1983: 101]的启发）。

根据戈伦树·赫默伦（Goran Hermeren 1983: 101）的观点，只因“人类想像的局限性”，我们把图 1c 看作人脸，因为它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上面是一个罐子，底部是一些鹅卵石和折断的火柴，一根棍子放在开口上”。因此，在比尔曼（Bierman）看来，这应该是模棱两可的。这完全取决于在人类想象力的界限内，其被解读为什么：即格式塔原则，脸作为首先被感知到的对象（cf. E. Gibson 1969: 347 ff）等等，都共同促使其中一个确定的解读。虽然我们有可能找到赫默伦认为应该在图像中出现的元素，但是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而不被其他解读所干扰。因此，当一个表达与不同的内容或对象相似时，由于表达本身的特性，其中的一个表达可能会被优先感知，并且其感知速度先于规约。

毫无疑问，对人类来说，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甚至对新生儿来说，脸也是被优先感知的。在比人脸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层面上，我们可以想想“我”

（Me’）的故事，“我”从未见过纸，因此，在形成图像符号的内容平面的过程中，就会受到阻碍。（cf. Sonesson 1989）。但是，似乎还有一些更普遍的事实，三维性，有生性以及运动可能比它们的对立面更为突出，即是说，它们更可能形成像似符的内容方面，而不需要任何补充性规约。曼·雷和谢莉·莱文的台球桌之间的比较即为三维性的实例。至于墨西哥女人的“芭比娃娃”，我们要么假定她仅仅是做了一个比喻，要么就是浅色皮肤的人在她对人的概念中如此陌生，以至于有生性，甚至是人性都被压倒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显著层次¹²。

事实上，为了理解初始像似符，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显著层次。思考一下博尔东和瓦利恩特（Bordon & Vaillant 2002: 59; Vaillant 1997）针对我的原型层次提出的一个反例：对于巴黎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个摩托车的冰雕不像对一辆真正的摩托车那么熟悉，然而当前者展现在市政厅的时候，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人来说，冰雕都是能指，而摩托车是基础，认知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 1975; Rosch, Mervis 1975）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显著概念的特征与原型性、频率、强度、名人，信息等等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某些场合，“熟悉”可能与显著相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是这也意味着显著的概念是不清楚的：至少，它似乎太无限制了。无论如何，正如我上面所设想的那样，原型层次不适用于像这样的对象（除了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脸），而适用于它们的一些特性。也许当冰不是作为一个摩托车的冰雕像，而是作为材料，与摩托车零件相比起来，其可能会被认为“不那么显著”（也许是在人类历史上更为同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我”的故事中，纸张体现出显著性，而不是由纸张制成的特殊物体，后者处在非常高的层次上。

但是这个实例也和我上文讨论过的那个实例很不一样，它们要么涉及一个代表三维对象的二维对象（如图像的情况），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三维对象成为其所属种类，或者它特性中的一部分或诸如此类的符号。然而，这与我在其他地方（例如[Sonesson 1989: 336ff], in press）所采用的案例类似：裁缝的假人和在日本餐馆中见到的由塑料或蜡制成的假食物。那个讨论的结果是，在人类世界中，某些特性在本质上更为显著，例如，除了三维之外，还有赋予生命和

¹² 戴维森（Davidsen）和蒙霍姆·戴维森（Munkholm Davidsen 2000: 82）在一篇充满好奇心的小文章中指责我，因为在他们看来，显著层次的概念显然只能解决像似符自然不对称的问题：而其“可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形象是另一个人的像似再现……，这对系统化相对主义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系统化相对主义不再那么相对。实际上，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是主观相对的。

运动。当然，这些特征中的最后一个，显然是使得真正的摩托车比用冰雕刻出的摩托车更突出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假食品的实例中作出更普遍的论证。用蜡制食物代表真正的食物，而不是用真正的食物代表蜡制食物，这是有原因的。食物是由可食用这一功能特性（或吉布森所说的“功能可见性”，J.吉布森[J. Gibson 1982]）所定义的，而这正是蜡制食物缺乏的特性。同样，摩托车是由作为车辆的特性所定义的，而冰雕却难以实现这一点。如果这表明冰雕摩托车不是真正的反例，它也表明了次生像似性的复杂性。我们不应该期望原型层次形成一次性固定的刚性结构¹³。

然而，这次讨论得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经验是，初始像似性和次生像似性不应该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事物：正如一个符号可能同时包含像似的，指示的和规约的特性一样，初始像似性和次生像似性也能很好地相容。

2.2 语言和图像的像似性

在谈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时，索绪尔实际上（正如贝蒂尔·马尔姆伯克[Bertil Malmberg 1977: 131ff]最清楚地指出）关心两种不同的关系：符号内，表达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符号和我们的经验世界（通常被称为指称物）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内容和表达没有共有的特性；第二种关系是也任意的，因为（根据索绪尔的观点），世界本身的分割并没有预示符号划分世界的方式。因此，把“bull”一词读作 / bul /而不使用声音序列/ bof /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而另一方面，现实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是否要用某一符号来表征某一现象，如“木”这个字，或者在两个不同的符号之间进行划分，如“灌丛（bois）”和“森林（foret）”。如果可以在符号的不同的元素中找到随意性，其反面，即理据性，这一索绪尔用于像似性的术语，也必须能够在多种关系中表现其本身（见图 2）并参阅（Sonesson 1989: 203ff）¹⁴。更谨慎地说，我们也许应该谈论三种潜在的像似关系：表达与内容之间，表达与指称物之间，以及内容与指称物之间。

¹³ 这也表明，上面给出的“芭比娃娃”的实例比我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有生气以及类似的角度来看，甚至这个墨西哥女人也不认为娃娃比金发的人更加显著（或者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注意头发，皮肤颜色等时，比起在瑞典看到的外国人，她把芭比娃娃放在更高的层次上。这是隐喻的产物（see Sonesson 1989,2010）。换句话说，这是区分的出发点，而区分的出发点对文化符号学是基本的。（see Sonesson 2000b）。

¹⁴ 我们能够很自然地理解理据性包括规约性和指示性，但这并不是索绪尔对这个术语的用法。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其实只是对“相对动机”感兴趣，而“相对动机”是指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表现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用“pomme”（“苹果”）来解释“pommier”（“苹果树”）。然而，在索内松 1989 中我所引用的其他段落中，他谈到了理据的模仿，但是有“随意性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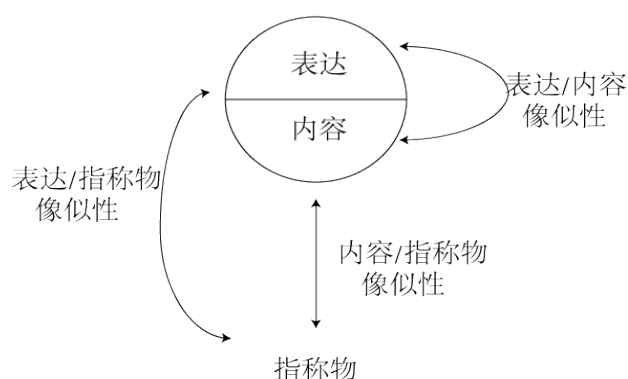


图 2.语言符号箭头代表（潜在的）像似关系。

此外，所提及的两个案例涉及到相似性或其反面的不同方面：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涉及的是表达和内容的不同细分；在第二个例子中，这是符号的外部边界以及所涉及到的世界上的相应的现象。如果说第一个处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已知的水平上，用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话来说，就是“记号素”，那么后者一定是在符号这一水平上。另外，前者分别涉及表现和内容的特性，后者则涉及到符号和现实中相应部分的分割的方式。

在图像中，情况更加复杂。胡塞尔（1980）和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 1980）分别论证说，我们在所描述的对象中直接“看到”到物理对象，即图像表达，使得表达的每个元素或多或少地与内容相对应。但胡塞尔继续指出，这不是全部，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在照片表面的斑点中看到人类的身影，但我们所看到的图像仍然是“摄影的色彩”，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皮肤的色彩。可能这看起来是一个过时的观察，但实际上所有的图像都会缩小与现实相关的色彩范围。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图像物体”是可能歪歪扭扭地挂在墙上的东西，“图像对象”是画面中黑白的孩子，“图像主体”是世界上被描绘的对象，即真正拥有玫瑰色脸颊的孩子。但是，胡塞尔谨慎的现象学似乎在这里还远远不够。为了把图像对象和图像主体分开，胡塞尔还指出图像中的宫殿和在柏林的真实宫殿之间的区别。然而，即使事实上柏林可能没有任何宫殿，但这也不妨碍我们注意到黑白宫殿与真宫殿的区别。因此，“指称物”必须与图像主体分离，图像主体处在类型符这一水平，因为它与图像对象不同，只因它增加了对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

3. 像似性的两个极端：从拟态到表演

在属于所有像似性的夜晚，以下这些“同样的东西”：拟态、图像、模仿、和模拟表演之间没有区别。与此相反，我们将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探讨像似性与拟态及类似现象的关系，以及像似性与模仿在几个术语意义上的关系。在第一种情况下，根本问题是哪一个概念具有像似性。第二种情况涉及更微妙的情況，即一个人的行动向另一个人呈现¹⁵。

3.1 拟态，稻草人和雕像

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2002）提出，无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符号（或他所说的“再现”）是在国王和其他英雄死亡后人们为他们树立的雕像中发现的。这个重建背后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对一些特定的人或部落或文化来说的）重要的人死去了，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就必须创建一个替代物。有另一种更为普通的用法，人类要吓跑田野上的鸟类（假设“人类”是鸟类的世界中的一个概念），但是人类不能总是一直待在田野周围，于是就在他们所处的地方竖立一个稻草人。或者我们把范围限定到杰出的个人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皇帝，以及这个时代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两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复制品。这个观点可以被推广到所有用以代替不在场的另一物的符号。

但是稻草人和复制品都与人类无关。如果我们以语言，图像和手势等事物来作为后者的例证，那么它们都不是典型的符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符号代表我们的经验世界——即，用皮亚杰的话说，符号是“从‘主体’的角度”（尽管通常这个主体是社会主体）来构想的。稻草人，复制品以及（可能也有）雕像并不在人类缺场时代表人类，而是在呈现其自身。可以这样理解，替代可能与伪装同属一个大类，但是却恰恰与符号相反。用迪肯的话来说（Deacon 1997: 76ff），动物世界里的伪装（比如鸟类眼中飞蛾的翅膀就只是“树的另一部分”）与像似性中的这一“典型例子”基本一样，我们习惯称后者为图像（Sonesson 2006）。事实上，只有伪装才会有这种作用，即到“看不出其本身是什么”的程度，相反，一张图片，或任何其他符号，只能作为一个符号，只能到被视为一个符号的程度，而不能作为对其描述或意指对象的另一个事例（即，一张香蕉的图片，不能用以表示香蕉这一类别下的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就这一点来说，就像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制品一样，稻草人就像是一种伪装，因为它们只能完成自己的功能，只要它们不被认出其本身的样子，即分别不是

¹⁵ 不言而喻，这里讨论的模仿，模拟和其他现象也可能具有指示性的和规约性的特征，但这些我们不作讨论。

萨达姆·侯赛因和真正的人类。正如金兹伯格所述，雕像看起来与我们的稻草人相似。它们与动物世界中常见的伪装（当然不是作为一种军事程序）仍然不同，它们的创造者（尽管不是他们的接收者）知道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东西。

但是，也许从一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看雕像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稻草人：人们知道雕像与英雄不同，但仍然以雕像替代英雄的位置，而非让雕塑成为他们。或许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替身，就像这个名词在戏剧中被使用的那样：替身接替通常由知名演员扮演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替身是演员。此时此地，在表演这一目的下，替身简单地等同于这个演员。的确，我们应该想一想稻草人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稻草人是出于某个特定目的代替人类的東西，但肯定不是在意指“人类”。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很好地应用了塞尔（Searle 1995）的“在 C 情况下，以 X 代表 Y”这一公式。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肖像、替身和稻草人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果用以下这种方式理解它们，即它们代表了一些与它们自身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了把握它们的功能，你必须明白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否等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肯定存在区别，两项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的关系：但是在任何意义上一个项都不可能由另一项的主体（包括一个集体主体）所代表。要看出这个区别，可以将它们与范例进行比较（这些东西代表着它们自己、它们所属的范畴，或者它们拥有的某些特性），尤其是在其他地方称为伪身份的东西，这些对象拥有其所代表的全部或者最具感知特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定义它们的东西，如无法食用的蜡质食物，在商店橱窗上展示衣料的假人（cf. Sonesson 1989: 336ff and 2.1）。

正如蒂莫·马南（2007）所观察到的，迪肯所使用的术语——伪装，是（生物）拟态的一个特例。根据马南的说法，模仿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有机体的信息（特征和信号），‘模仿体’，类似于另一种属于其他种类的有机体的某些信息，环境的某些特征，或者是其中任何一个的概括，这就是所谓的‘模型’”。马南明智地指出，同一物种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拟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类别成员与符号功能的区别。马南还指出，相似性应该为载体提供一些功能。例如，它可以保护动物免受常见掠食者的侵害。最后应该提到的是，以上所述不包括偶然的相似性，而只包括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具有连续性的那些相似性。

除了最后的特性之外，拟态与稻草人的情况类似：不被接收者检测到其本身，它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稻草人是一种人造的设备，这意味着，虽然对于信息的接收者来说，它只是环境的一个特征，但对于发送者来说，它至少有符号的区分和不对称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拟态中，发送者和接收者都不以任何

方式涉及任何类似于符号的事物。因此，模仿体和模型，以及像似性只存在于外部观察者眼中¹⁶。

3.2 作为学习过程和符号的模仿

在某种意义上，模仿显然是符号出现的核心。它也有明显的像似特性。皮亚杰（Piaget 1967 [1945]）认为，模仿，或者更确切地说，“表征性的模仿”是符号功能的起源。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些模仿的实例实际上就是符号，而另一些则显然不是。一些种类的模仿似乎确实是符号功能出现的先决条件。

默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在他的人类进化模型中，把模仿置于人类发展的第二阶段，模仿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儿童发展，并由乔丹·兹拉特夫（Jordan Zlatev 2007; 2009）做了更精确的考虑。唐纳德认为，模仿文化始于“有意识的，自发的，具有代表性的行动的出现，这是有意向的（即自愿的）而不是语言的”（Donald 1991: 168）。唐纳德给出的例子是手势、舞蹈、仪式、模拟表演、戏剧表演和（精确的）模仿，还有工具的使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具使用的社会概括）和技巧¹⁷。在模仿和语言之间的某个地方，符号功能出现了，唐纳德间接地表明了有意向的交流系统的使用和指称物的区分。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工具的使用和技巧被当做是模仿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像唐纳德在其他地方仅仅将其作为“日常行为”或“程序性记忆”，不遗余力地把它从模仿中分离出来。毫无疑问，唐纳德（1991: 171ff）会回答工具的使用及技巧同日常行为和程序性记忆是不同的，因为其遵守他所划分的模仿行动的标准：它们是“有意向的”（即自愿的）、“生成性的”（即可分解成许多部件，且部件可能重组为新的整体）和“传播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公众的”）。此外，它们有指称（“在模仿中，指称行为必须与指称对象区别开来”，用我们的术语来看，即区分），代表无数的对象，并且是自动提示的（无需外部刺激便可产生）。生成性是许多种意义的特性，而不是符号。但是，工具和其他许多技能的使用在哪些情况下是“传播的”，以及它们以哪种方式拥有指称和代表无数的对象，这些还并不明晰。

¹⁶ 在一个有洞察力的评论中，马南审查了我的关于动物意识不到伪装的假设。在许多动物群体（飞蛾，捕食者，青蛙）中，“在选择休息场所时，它们偏爱选择其外貌和周围的视觉环境达到最佳对应的地方”。然而，有趣的是，这个观察的基本机制仍不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校准的话，伪装显然是可能的。

¹⁷ 让人好奇的是，唐纳德（1991: 170）称他关于模仿的观点来源于文学理论家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后者用这个标题写下了现实主义文学史。如果用古人对于模仿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更适合，模仿或许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是用来描述感知现实和思想世界的关系的，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这一术语的用法之一是作为行动的再现，而不同于（口头）叙述。关于“模仿”的完全不同的意义，请参阅马南 2003。

表 2.模仿这一术语在不同意义上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模仿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把个别符从类型符中分离出来，模仿作为一个符号，取决于表现与内容之间的区别。

	模仿 （个别符/类型符）	作为学习的模仿 （从个别符中提取类型符）	象征性游戏 （表达/内容）	逢场作戏 （表达）/内容
	实例化行为中的类型符	从一个或者几个（新奇的）个别符行为中提取一个类型符	再现一个行为的类型符，或者可能是时间和空间范围外的个别符	在时间和空间中再现个体行为
直接	使用典型方法来实现钉钉子的类型符	观察钉钉子的动作（第一个个别符）从钉钉子过程中抽取类型符（第二个个别符）	了解母亲方的典型行为	此时此刻创造一个哈姆雷特的外观并且做哈姆雷特做的事
间接	以钉钉子做类型符行为	提取钉钉子的类型符	做母亲常常对孩子做的事	做文艺复兴时期哈姆雷特在埃尔西诺做的事
	作为行动的模仿——个别符 vs 类型符		作为符号的模仿——表达 vs 内容	

唐纳德（Donald 1991：172）在介绍“传播性”作为模仿的标准之后，接着说道：“模仿的源头可能不是作为传播的方式，而可能起源于不同的再生性记忆的方式，比如制作工具，本质上说模仿行动通常是公众的，并且天生具有传播的潜力。”这与作为符号的模仿非常不同，后者能通过一个行为者向特定的公众展示他的行为来表示；这甚至与孩子的象征性游戏不同，这个游戏必须能面向其他孩子且与他们分享。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首先从一个类型符中提取一个个别符，这个类型符假设把其他的个别符看作是一种表演，也就是被注视的东西（在索内松[Sonesson 2000b]那里被称为“表演功能”）；其次是认识工具行为，这不是指向公众的，但可以对外公开（表 2）。使用工具确实需要将典型特性与此时此地的单一行为分开，即相关性。为了学习使用工具，你至少应该能够将那些应该被模仿的特性与那些无用的特性分隔开来。然而，即使可以观察到这种模仿行动，但它不是观察目的的一部分。在舞台上用行为完成模

仿的例子是完全不同的。当表演“哈姆雷特”部分的演员举起“可怜的约里克”的头骨时，他的行动不仅仅在模仿丹麦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而且也将这种行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行动表现出来（cf. Sonesson, 2000b）¹⁸。儿童的象征性游戏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某种中间的情况，因为其引人注目的特征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它使得游戏功能成为游戏；事实上，这不是有意提供给不参与游戏的人的表演。

从上面的例子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具的使用和上文提到的其他种类的技能并不是严格的模仿，因为根据唐纳德自己的标准，虽然它们是“公众的”，但是它们不是传播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让自己向模仿靠拢，这导致了工具的使用和技能在社会中的普遍性。这是它们与日常行为和程序记忆不同的地方，它们在社会上是共享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只有在行为可以从独特的工具使用者中分离并转移到另一个使用者时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了能从另一个个别符中被识别，作为个别符的行动必须抽象为一个类型符。被共享的东西是类型符，换句话说，被共享的是解释的体系，它定义了相关性的原则（在这个情况下，挑选出对象特性的规则被映射到另一个对象中）。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在指称意义上），单一的模仿行动可能对应各种事件。

因此，通过模仿，“意识控制”就可以“扩展到行为范围”（Donald 2001: 261）。但在这种情况下，模仿行为本身并不是符号。如果我看到有人用石头作为工具敲破坚果壳，我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是为了思考我观察到的其他人的行动，而是为了获得同样的效果。我试图做与他同样的行动，就是打开壳，把坚果拿出来吃。我没有创造一个非主题化但直接给出的表达，这种表达涉及一个主题化但间接给出的内容，在开坚果壳所包含的行为类型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例子¹⁹。就像托马塞洛（Tomasello）的猿一样，当然，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手段来取得同样的效果，就会产生模仿的失败行为。或者，我只模拟开壳的外部动作，而不让它们在物理环境中获得足够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么是在做象征性游戏，要么是在逢场作戏，或只是练习动作。正如唐纳德个体传播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在学习意义上作为符号的模仿来自于自由模仿，但最有可能的是，一旦模仿实现，这类符号功能是作为奖励出现的，至少在现象学上，这两种意义上的模仿是截然不同的。

¹⁸ 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从接收者和/或解释者的观点来考虑符号。当然，演员的经验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艾斯特·沃苏[Ester Vosu]所指出的那样）

¹⁹ 正如马南所观察到的，比较心理学可能将这些行动描述为“刺激增强”的结果。然而，在平常的生活中，没有人会让我们关注特定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关注，这就是相关性（即类型符和个别符的区别）是模仿的先决条件的原因。正如许多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实践中，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见索内松，兹拉特夫 in press。

结论

我试图在本文中阐明像似性和像似符的一些重要但通常未被考虑的特性。首先，我认为如果符号要在理论发展和实证基础的符号学中有任何用处，它就需要一个定义，这个定义须比索绪尔或皮尔斯传统所给出的定义更加具体和明确。我与皮尔士后期的观点一致，他所有的术语都太狭隘，我选择通过把从未被索绪尔定义的索绪尔的符号作为一个好的关于符号的例子，来开放符号过程，这意味着图像和（至少有一些）手势也是符号，但是很多其他现象通常被认为不是如此，例如感知和接近感知的其他含义。我们必须求助于想像力中的现象学变体，以便得出一个具体的符号概念，但事实上，虽然胡塞尔本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聚焦和直接的标准，但是作为一个“难以发觉”的现象学家，皮亚杰发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特性，即上文胡塞尔所预设的区分的特性。一旦符号被像似性、指示性和（在稍微不同的独立性意义上）规约性等特性单独定义、以及一旦像似的、指示的和规约的基础被证明可以在直接经验中找到，且与符号功能相结合，皮尔斯的观点就可能会被调整，而不会在充满所有像似性的夜晚中迷失，在这样的夜晚中，拟态和模拟表演以及其间的一切都无法分开。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讨论了符号中像似性可能在符号中呈现的两种方式，要么作为符号的条件，要么作为符号的结果，从而分别产生了初始的和次生的像似符。就初始像似符而言，我们将先前被称为相似性的感知，而后注定要变成表达和内容的概念作为假定符号关系的原因，如果不是如此，符号关系是没有其他理据性的，或者至少在没有相似性感知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充分的理据性的。相反，只有符号被认为是相关的时候，次生像似符才能使得表达与内容之间的相似性能被感知到，这要么是因为有太多不同的东西存在这种相似性以至于这种特殊的相似性没有办法被识别，要么是因为没有符号关系，这个问题中的事物不会被视作符号，而是作为对象本身。在最初定义的视觉像似性领域，真实的图片能从图示猜谜、身份符号以及相似的意义中区分出来，这种区分已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毫无疑问，这种区分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就其本身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一旦仔细观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初始和次生像似符之间存在许多中间情况，是不能用现在定义的区分所说明的。而且，除了基于声音的语言像似性之外，语言像似性似乎只是次级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区别在这个领域没有多大的用处。

在第三部分中，从生物意义上来说，拟态以及其他一些现象，如雕像和稻草人，与真实的符号是有区别的，因为在解释者对于它们的认识这一部分，它们与符号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从唐纳德的模仿概念出发，模仿被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一类是学习，假设从一个个别符中提取一个类型符，从而成为符号

的先兆，而另一类是符号，这是在哑剧和戏剧中出现的情况。然而，这个区别需要进一步阐明。像似性显然是一种多样化的现象，需要更多进一步的研究来理解其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当然不应急于宣布完成了像似理论。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弄清楚这种差异，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案，虽然这可能不是一个等级方案²⁰。

参考文献：

- Ahlner, Felix; Zlatev, Jordan 2010. Cross-modal iconicity: A cognitive semiotic approach to sound symbolism. *Sign Systems Studies* 38(1/4): 300–345.
- Arnheim, Rudolf 1969. *Visual Thinking*.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64. Rhétorique de l'image. *Communications* 4: 40–51.
- Bordon, Emmanuelle; Vaillant, Pascal 2002. Le status du signe iconique entre iconicité et intertextualité. *VISIO* 6(4): 57–74.
- Call, Josep; Hribar, Alenka; Sonesson, Göran (forthcoming). Recognition of pictures and video by a chimpanzee. In: Sinha, C.; Sonesson, G.; Zlatev, J. (eds.), *Signing up to be Human*.
- Carani, Marie 1999. Voir, penser, décrire et percevoir l'objet visuel. L'épineuse question de l'applicabilité des modèles sémiotiques en domaine visuel. *VISIO* 4(2): 9–30.
- Cavallin, Jens 1990. *Content and Object: Husserl, Twardowski and Psycholog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²⁰ 我终身都关注着像似性，但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一直参与其中的不同的项目（SGB 和 SEDSU）以及自 2009 年 1 月以来我领头的认知符号学中心的内部合作，都为我的旧主题提供了新的展望，而我在本文中已经试着利用这些展望了。我想在这里感谢上述论坛上的无数讨论为我提供的许多帮助。

-
- CP = Peirce, Charles S. 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I-VIII*. [Hartshorne, C.; Weiss, P.; Burks, A.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text references given as CP, followed by volume and paragraph numbers].
- Davidson, Erling; Munkholm Davidson, Helle 2000. Iconicity and evidence. In: Johansson, Troels Deng; Skov, Martin; Brogaard, Berit (eds.), *Iconicity —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Semiotics*. Aarhus: NSU Press, 81–90.
- Deacon, Terrence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New York: Norton.
- De Cuyper, 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Amsterdam: Ben-jamin.
- DeLoache, Judy S. 2004. Becoming symbol-minded.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2): 66–70.
- DeLoache, Judy S.; Burns, Nancy M. 1994. E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pictures. *Cognition* 52(2):83–110.
- Donald, Merlin 1991.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A Mind So Rar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orton.
- Eco, Umberto 1999. *Kant and the Platypus. Essays o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 EP = Peirce, Charles S.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s. I-II*. [Ed. by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text references given as EP, followed by the volume number].
- Gibson, Eleanor J. 1969. *Principles of Perceptu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Gibson, James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1982. *Reasons for Realism. Selected Essays of James J. Gibson*. [Reed, E.; Jones, R. (eds.)] Hillsdale: Lawrence Elbaum.
- Ginzburg, Carlo 2002. *Wooden Eyes: Nine Reflections on Distance*. London: Verso.
- Goodman, Nelson 1968. *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imas, Algirdas J.; Courtés, Joseph 1979.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Hachette.
- Gurwitsch, Aron 1964.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 Heine, Bernd; Kuteva, Tania 2007.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merén, Göran 1983. *Aspects of Aesthetics*. Lund: CWK Gleerups.
- Hockett, Charles F.; Altmann, Stuart A. 1968. A note on design features. In: Sebeok, T. A. (ed.), *Animal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of Study and Results of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61–72.
- Husserl, Edmund 1913.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Tübingen: Max Niemeyer.
- 1939.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Prag: 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
- 1980. *Phantasie, Bildbewusstsein, Erinnerung. Husserliana: Gesammelte Werke XXIII*. The Hague: Nijhoff.
- Mallery, Garrick 1972[1881]. *Sign Language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 The Hague, Paris: Mouton.
- Malmberg, Bertil 1977. *Signes et symboles. Les Bases du Langage Humain*. Paris: Picard.
- Maran, Timo 2003. Mimesis as a phenomenon of semiotic communica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31(1): 191–215.
- 2007. Mimicry. In: Bouissac, Paul; Lewis, Ann (eds.), *Semiotics Encyclopedia Online*. E.J. Pratt Library, Victoria University. <http://www.semioticon.com/seo/>.
- Nordström, Gert Z. 2000. Semiotiken idag — lingvistisk imperialsim eller fenomenologisk narcissism. *Bild i skolan* 1: 16–19.
- Parmentier, Richard J. 1985. Signs' place in medias res: Peirce's concept of semiotic mediation. In: Mertz, E.; Parmentier, R. J. (eds.), *Semiotic Mediation.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rlando: Academic Press, 23–48.
- Parron, Carole; Call, Josep; Fagot, Joël 2008. Behavioural responses to photographs by pictorially naive baboons (*Papio anubis*), gorillas (*Gorilla gorilla*) and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Behavioural Processes* 78(3): 351–357.
- Peissig, Jessie J.; Young, Michael E.; Wasserman, Edward; Biederman, Irving 2000. The pigeon's perception of depth-rotated shapes. In: Fagot, J. (ed.), *Picture Perception in Animals*. Hove: Psychology Press, 37–70.
- Piaget, Jean 1967[1945]. *La formation du symbole chez l'enfant. Imitation, jeu et rêve, image et representation*. [3th ed.] Neuchatel: Delachaux & Niestlé.
- 1967. *La psychologie de l'intelligence*. Paris: Armand Colin.
- 1970. *Epistémologie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Gallimard.
- Rosch, Eleanor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3): 192–233.
- Rosch, Eleanor; Mervis, Carolyn B.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73–605.

Saint-Martin, Fernande 1994. Avant propos: Pour en finir avec la mutité de la peinture. *Nouveaux actes sémiotiques*, 34/35: 1–4.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73.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de Mauro, Tullio] Paris: Payot.

Searle, John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mith, Barry 1994. Top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In: Echenbach, C.; Habel, C.; Smith, B. (eds.), *Top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Hamburg: Graduiertenkolleg Kognitionswissenschaft, 3–22.

– 1995. Formal ontology, common sense, and cognitive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43: 641–667.

Sonesson, Göran 1989. *Pictorial Concepts. Inquiries into the Semiotic Heritage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Visual World*. Lund: ARIS/Lun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The semiotic function and the genesis of pictorial meaning. In: Tarasti, Eero (ed.), *Center/ Periphery in Representations and Institutions. Proceedings from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Institute, Imatra, Finland, July 16–21, 1990*. Imatra: Acta Semiotica Fennica, 211–156.

– 1993. Pictorial semiotics, Gestalt psychology, and the ecology of perception. *Semiotica* 99(3/4): 319–399.

– 1995. On pictoriality. The impact of the perceptual model in the development of pictorial semiotics. In: Sebeok, T. A.; Umiker-Sebeok, D. J. (eds.), *The Semiotic Web 1992/93: Advances in Visual Semiotic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67–108.

– 1996. An essay concerning images. From rhetoric to semiotics by way of ecological physics. *Semiotica* 109(1/2): 41–140.

– 2000a. Iconicity in the ecology of semiosis. In: Johansson, T. D.; Skov, M.; Brogaard, B. (eds.), *Iconicity —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Semiotics*. Aarhus: NSU Press, 59–80.

– 2000b. Action becomes art.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atre, play, ritual — and life. *VISIO* 5(2) (Automne 2000: Les arts de l’action/Action Art, van Mechelen, M.; Sonesson, G. (eds.)), 105–122.

– 2006.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34(1): 135–213.

– 2007. 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 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emiotics. In: Ziemke, T.; Zlatev, J.; Frank, R. M.

(eds.),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 1. Embodiment*.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85–128.

-
- 2008. Prolegomena to a general theory of iconicity. Considerations on language, gesture and pictures. In: Willems, K.; DeCuyper, L. (eds.), *Naturalness and Iconicity in Language*. Amsterdam: Benjamins, 47–72.
 - 2009a. New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 — and, marginally, some other animals. *Cognitive Semiotics* 4: 134–169.
 - 2009b. The view from Husserl's lectern. Considerations of the role of phenomenology in cognitive semiotics. *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 16(3/4): 107–148.
 - 2010. Semiosis and the elusive final interpretant of understanding. *Semiotica* 179(1/4): 145–258.
 - (in press) Semiosis beyond signs. On a two or three missing links on the way to human beings. Acts from *Missing Links Conference, Copenhagen, November 22nd–23rd 2007*.
 - (forthcoming) From iconicity to pictoriality. To appear in *VISIO: Iconicity revisited/Iconicité revisitée*.
- Sonesson, Göran; Zlatev, Jordan (forthcoming). Conclusions of the SEDSU project. In: Sinha, C.; Sonesson, G.; Zlatev, J. (eds.), *Signing up to the Human*.
- Stjernfelt, Frederik 2000. Mereology and 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28: 73–98.
- 2007. *Diagrammatology.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 of Phenomenology, Ontology, and Semiotics*. Dordrecht: Springer.
- Tomasello, Michael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Trevarthen, Colwyn; Logotheti, Katerina 1989. Child and culture: Genesis of co-operative knowing. In: Gellatly, A.; Rogers, D.; Sloboda, J. A. (eds.), *Cognition and Social Worl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7–56.
- Uexküll, Jakob von 1956. *Streifzüge durch die Umwelten von Tieren und Menschen — Bedeutungslehre*. Hamburg: Rowohlt.
- Vaillant, Pascal 1997. *Interaction entre modalités sémiotiques. De l'icône à la langue*. Thèse de doctorat. Paris: Université Paris-Sud (Orsay).
- Wollheim, Richard 1980. *Art and its Obj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latev, Jordan 2007. Embodiment, language and mimesis. In: Ziemke, T.; Zlatev, J.; Frank, R. (eds.),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 1: Embodimen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97–337
 - 2009. The semiotic hierarchy: life, consciousness, signs and language. *Cognitive Semiotics* 4: 170–201.

Zlatev, Jordan; SEDSU-Project 2006.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gn use (SEDSU). In: Cangelosi, A.; Smith, A. D. M.; Smith, K. (eds.),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VOLANG6)*.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379–388.